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陈忠实 李继凯



【第三十册】

#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 延安作家（六）

李继凯 翟二猛 宋颖慧等 / 编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三十册】

总主编 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 陈忠实 李继凯

#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 延安作家（六）

李继凯 翟二猛 宋颖慧等 / 编著

# 严辰

## 传略

严辰(1914—2003),原名严汉民,笔名:厂民、屯日、刘亡、安弥、安敏、严仪、严辰、严翔、杨坪、沈彦等,江苏省武进县(今武进区)人,现代诗人。1914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小乡镇上,自小跟随母亲在家务农,父亲是个小商人。1927年考入苏州中学附属吴江乡村师范,接受到零星的文学启蒙,开始偷偷阅读一些进步作家作品。1930年秋起,在县报上发表一些诗歌,编写了一个时期的诗歌副刊《怒涛》。

1934年开始在《申报》《诗歌月报》《文学》《现代》等报刊上发表诗作,写诗歌也偶尔写散文、小说。曾创办《当代诗刊》,通过投稿、通信认识一些作家、诗人,后加入中国诗人协会。抗日战争初期到过武汉、重庆,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大地画刊》《文艺阵地》《抗战文艺》《文艺月报》等刊物上发表诗作。

1940年开始计划去延安,在宝鸡遇到艾青、张仃、罗烽,遂与逯斐加入同行,经历了许多盘查,终于到达延安。1941年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创作,接触了更多的文艺界艺术家,得到了更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3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参加“文艺整风运动”,其间曾到部队深入生活。1944年去南泥湾三五九旅访问,回到延安后调到中央党校任第四部教员。其间写下了第一支对革命圣地的颂歌:《延河恋歌》(后改名《唱给延河》),曾用AM的署名,发表在桂林的《诗创作》上,并出了单行本。此后严辰创作了《早晨》《塔》《路》《我们的队伍》《暂别》等诗,主要描写诗人到达延安后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感受,表达他对延安、边区人民和人民子弟兵的热爱。

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晋察冀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文学系任教员,参加过“土改运动”,了解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斗争与生活,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写过《新婚》



严辰

《生命的春天》《伟大的慈心》等有特色的诗歌,后编进了《晨星集》。1948年去太原前线,后又转赴北京前线围城部队,北京解放第一天,随部队入城。在北京,先在文教接管委员会工作。第一次文代会前后,负责编辑会刊《文艺报》。中国作家协会成立,筹备创办《人民文学》,任编辑部主任。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去朝鲜中线志愿军部队,写了诗集《战斗的旗》。



《严辰诗选》书影

此后,在北京先后任《新观察》主编、《诗刊》副主编、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作协黑龙江省分会副主席兼省民研会主席、《北方文学》主编、《诗刊》主编、《诗刊》顾问、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

1953年再次到朝鲜,创作了诗集《英雄与孩子》。1954年,到长春、北大荒、南京、韶山等地参观。1956年访问过苏联,写了访问苏联的诗集《最好的玫瑰》。1957年冬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前往黑龙江,写出了不少关于黑龙江大森林以及表现黑龙江人民生活变化、歌颂革命斗争先烈等的诗篇,收入《山丹集》。从1961年到1963年,曾访问新疆、海南岛、雷州半岛,写下了《白杨篇》《红棉篇》与写黑龙江的《青松篇》一起合集为《春满天涯》。

1979年8月中国作协派作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严辰任团长,参加的有刘心武、鄂华。其间他创作了不少诗作,后来这些作品以“玫瑰”为题,加上部分1957年、1961年出访苏联和波兰的部分作品,以《玫瑰和石竹》作诗集名编入了诗刊社主编的《诗人丛书》第一辑。

严辰的其他诗集有:《红岸》(1959年)、《繁星集》(1959年)、《青青的林子》(1960年)、《迎春曲》(1951年)、《红霞集》(1962年)等,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严辰诗选》。

2003年9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著名诗人严辰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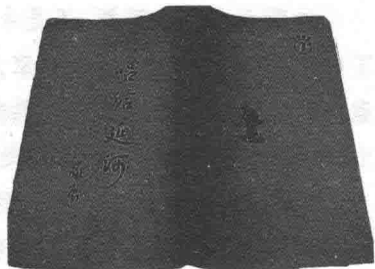


代表作品

### 《唱给延河》(新诗集)

内分三辑,收现代新诗二十八首。第一辑“星的歌”共十二首,包括:《星的歌》《野花》《夜航船》《外祖母》《歌夜》《夜行》《沙窝》《花马池》《城头上》《缝》《生产短歌》《塔》,诗中着重反映了作者对新生活的感受与热爱,其中写于1943年的《生产短歌》,表现了“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以及诗人的思想变化。第二辑“漠地诗抄”共八首,包括:《马》《阿拉川》《马

会》《沙漠》《庙子》《井泉》《夜》《晨》，是作者1941年秋冬在陕北“三边”和伊克昭盟生活的真实再现，它描绘了波浪起伏的沙漠、自由奔驰的马群和那热情豪爽的蒙古牧民的生活。第三辑“唱给延河”共八首，包括：《我来了》《在河边》《奔流》《早晨》《播种》《黄昏》《故事》《暂别》。通过对延河的歌唱，热情歌颂了延安美好的新生活，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圣地延安和根据地人民的爱戴。这些作品创作于1941年到1942年间，作者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好像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创作激情奔涌。《唱给延河》就是在这种激昂奋进的精神状态下创作的，对于现实生活反映得过于理想化。



《唱给延河》书影

## 《晨星集》(新诗集)

此诗集是在过去曾经出版的《唱给延河》《生命的春天》等诗集的基础上重新选辑而成的。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分五辑，共三十九首。除第五辑的《土地》一首写于1950年外，其余为1941年至1948年所作。严辰自延安文艺整风以后，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题材都是从现实斗争中摄取的，诗歌的形式和语言的运用，都明显地体现了“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其中《神兵连》《江波大队》《八年》《阿拉川》《马会》《播种》《暂别》《生命的春天》等写得各有特色。《神兵连》和《江波大队》生动地描绘了抗日游击队在人民群众支持拥护下成长壮大的情景。有的诗歌歌颂延安新生活的美好，歌颂人民领袖和人民军队的伟大功绩，有的诗作描写了波浪起伏的沙漠、自由奔驰的马群和热情豪放的蒙古牧民的生活，也有个别诗作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人、农民的幸福和欢乐。



## 关于诗歌大众化<sup>①</sup>

严辰

### 一、问题的再提出

最近诗歌工作的同志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诗歌大众化的问题。我觉得，这问题在今天是有它特殊意义的，愿意提出个人所感到、想到的一些粗浅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sup>①</sup>原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日。



诗歌大众化这课题,不是今天才提出;差不多它和新诗的产生一同早被大家注意到了。当每一次时代的浪潮高涨,现实要求于文艺,要求于诗歌创作更迫切的时候,这问题也一次比一次地深刻开展和具体化起来。

今天我们的再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下面的两种根据:

首先,我们的抗日战争临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我们胜利的信心益加坚定,我们克服困难的意志益加强韧。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期,这是一切力量充分发挥为抗战而服务的时期,作为诗歌工作者的我们,应该怎样配合这时代,肩负起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新的任务,是今天每一个诗歌工作者所关切也所愿献身的。

其次,我们经过了半年多的整风学习,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以及最近新倡导工农写作问题的提起,都使我们的思想方法有所反省,工作方式有所改变。我们有了新的觉悟,对问题有着最深的看法。好好地检讨过去,重新辨认与决定此后努力的方向,这是必要的,也是每一个革命的诗歌工作者所苦苦思虑、所热烈追求的。

因此,我觉得诗歌大众化问题的再提出,并不是对过去的因袭,而是认识更清楚、步伐更开阔地向前发展,而是对于以后创作实践方向的新的理解。

## 二、把不正确的观念扬弃

对诗歌大众化的问题,过去曾有过——也许现在还多少有着一些相当糊涂的观念,即是有人把大众化看作庸俗浅薄的同义语。这,不只是普通的人,连很多诗歌工作者,都无意或明或暗地有这看法。他们以为诗是最最高贵的,是沙龙里的产物,庙堂之上的金饰。他们认为只有用铅字排的,装订成漂亮的册子的才是诗;用石灰写在路边的,用纸贴在街头的就不是诗。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大众能懂得诗,他们轻视大众,因此也轻视诗歌大众化。有政治偏见的,他们把诗歌大众化看成一种政治手段;艺术至上者以为:“不能创作高级作品的人,才叫喊大众化,以大众化为维持他诗歌生命的可怜的救命圈!”

在从事于诗歌大众化的工作者本身,也还不够健全。他们赞成诗歌大众化,然而,他们也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手段,一种时髦的运动。因此,在大众化的另一面,仍然有着个人的非大众化的创作。他们跑到街头,高呼大众化;回到房间里,又另抒写个人生活情绪的东西。他们是矛盾的,两面性的,他们把大众和个人划开,把自己看得高高在大众之上。这样的大众化工作,即使表面上热闹过一阵,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成绩的。诗歌既不会大众化,大众也不曾受到一点影响。诗歌自诗歌,大众自大众。

另外,我觉得大众化和通俗化这两个名词的含义并不是一样的。似乎有些人常常把大众化理解成通俗化,于是硬套一些陈旧死板的旧形式,胡乱搬几句迎合大众胃口(其实也不一定迎合)的“他妈的”之类的口语,就以为是大众化了。这错误是由于把大众化看成仅仅是形式的、表面的、迁就的之故。这样的东西不但不能提高大众,教育大众,在艺术上不能有丝毫的价值,反而自己陷到庸俗的泥坑里去了。

我们必须把这些以诗歌大众化为庸俗,看作是附带的工作,是迁就大众等不正确的观念全都抛掉,然后诗歌大众化的开展才有希望。

### 三、被大众所化

是不是抛掉了不正确的观念,我们的诗歌就能大众化了呢?这还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对诗歌大众化有一种正面的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把大众化看作是政治口号,是暂时的东西。不错,这可以是一句口号,一种运动,但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口号与运动上面,而必须把大众化当作一个长期努力的唯一的创作方向。

在未来的新社会里,及在今天的新的环境里,已经完全是集体主义了。只有集体才有力量,只有集体才能发展,非个人时代可代替的。在诗歌上发现个人的东西,早已不再为人感兴趣,从天花板寻找灵感,向醇酒妇人追求刺激的作品,早就被人唾弃,早就没落了。只有投身在大时代里,和革命的大众站在一起,歌唱大众的东西,才被大众所欢迎。那么,企图把个人和大众划分开来的想头根本是要不得的了。除了为大家,还有什么个人的价值?除了大众化,还有什么别的诗歌的存在与出路呢?

这样,大众化成为我们行进的方向是必然的。

怎样才能大众化呀?这不只是诗歌创作一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诗歌工作者的生活、思想意识等的问题,必须我们先被大众所化,融合在大众中间,成为大众的一员,不再称大众为“他们”,而骄傲地和他们一起称为“我们”;不只懂得大众的生活习惯,熟知大众的语言,更周身浸透大众的情绪、情感、思想,以他们的悲痛为悲痛,以他们的欢乐为欢乐,以他们的呼吸为呼吸,以他们的希望为希望……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不会矛盾,我们的创作才不会有两面性,我们的大众化才不是勉强而是自然的了。

所以,我们说大众化,说为大众,不仅要在理论上、创作上表现,更应该在行动上表现。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硬壳中脱出,毫不惋惜毫无保留地浸润在大众一起。这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今天脱掉长袍马褂,明天穿上短袄草鞋就行的。这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是一宗不断克服不断努力的工作,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应走的唯一的道路。

只有“移动重心”的实践上的诗歌大众化,才能从过去的既有成果上跨进一步。我们的生活、情绪被大众所化了,是不是我们就变得庸俗、粗野、浅薄呢?是不是我们就跟大众做尾巴呢?不是的。大众化绝不是庸俗、粗野、浅薄,我们也决不让自己庸俗、粗野、浅薄,我们更不是做尾巴,什么都迁就降低,我们决不忘记教育与提高他们的责任。——从“大众化”而提高大众。只有这样,大众化才有前途。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说一说什么叫“大众”,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过去诗歌大众化曾经在把“大众”当作抽象名词这点上吃过亏,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这所说的大众究竟是谁?大众的范围怎样?

这里所说的大众,是革命的大众,是工农无产阶级,他们的数量,占全民族人口的绝大多数,除了他们而空言大众,那是不会有结果的。

### 四、提倡大众自己创作的诗歌

大众原是富有创作天才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多优秀的民间文艺,在农村里传播

很广的民谣、民歌、秧歌、各种曲调，都是大众自己创作的成绩。只是他们过去受着种种压迫，而一些自命高雅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又把他们的创作偷窃或者改削，锁进了庙堂，以致他们的发展被限制，他们的才能被挫伤。

我们要诗歌大众化，融洽地密切地和大众结合，最好当然是提倡工农自己创作的东西。只有他们的东西才是新鲜活泼的，生动坚实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的。

也许我们以写诗为职业的诗人们会摇头，感到这样一来自己会岌岌可危吧！但是抬头的总是要抬头，新生的总是要新生。这已不是我们把诗歌霸占的时候。我们不打开门，不把原是从大众那里偷来的诗歌交还给大众，大众就会撞开铁门自己来索取的——而且已经伸长了手自己在索取了。我们“宗派”地守卫，怕自己失去这专利品、这神圣的桂冠的想法，只是自我欺骗罢了。在诗歌工作者，要不没落，唯有自己先打开门来，欢迎并且服务于大众，融化于大众中间，成为大众之一员，再来努力，才能得救。

也许又有人要说：我们的大众太可怜了，他们没有文化，连字也不认得，怎会有自己创作的能力呢？然而，请不要担心。我们的大众是在进步着的，尤其是有着长期斗争经验的我们的革命大众，他们在自己的教育与锻炼之下，已经很快地进步了，他们不但有着非一般的阅读水准，并且还有着惊人的写作表现能力。在我们的工厂、农村和部队里，有着大众自己的文艺小组、文艺墙报、诗歌墙报。他们的生活经验多么丰富，他们写作的热忱多么高啊！从这样的大众中去提倡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真正大众化的诗歌，是很可能的；只在于我们诗歌工作者的悉心指导，发掘和帮助。这工作对于我们不是浪费，它不但能激励我们，影响我们，教育我们，在诗歌大众化上，更是一个新的生活与制度，有力的支柱，一个不竭的源泉。

### 五、创作实践上的二三问题

在今天，工农还不能大量地自己创作，诗歌工作者还不曾完全改造，而时代对诗歌的要求却异常迫切的时候，对于怎样使诗歌大众化运动更开展的问题，这儿不想触及，但在创作实践上至少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如内容、形式、语言等等，下面想谈一下。

内容方面——应该是现实的，革命的，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与反法西斯，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全国的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是今天最迫切需要表现的。对于大众的英勇斗争，伟大情感，新的生活与制度，一切生长与发展着的事物，都要歌颂，而那些只限于知识分子的象征、想象，虚幻的描绘，以及老八股洋八股的典据，都应废止。那种知识分子才具有的见月伤心，闻铃断肠，忸忸怩怩，装腔作态的感兴、感想，都应摒弃。

形式方面——应该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有斗争性的，新鲜活泼朴素自然的。我们要吸取旧形式的精髓，却不落到它陈旧的圈套里。我们要学习外来形式的长处，却不迷恋它的骸骨。我们是批判地接受与利用，弃糟粕而取精华，主要是为表现内容而注意形式。我们坚决反对的是那种《哭凄凄》《五更调》的死板的模仿，妨碍内容的旧瓶装新酒，以及把壮烈的情感套上虚弱的外衣的办法……

语言方面——应该是大众所熟悉惯用的，有普遍性的，富有形象的，生动活泼的，是



口语。可以利用方言,但不是迁就它的偏狭和简陋,而是吸取它丰富特殊的,以补语言的贫乏,通过它而使之普遍化。

有人反对用新的名词、外来的名词入诗,这是保守论者,只会使大众降低。要使语言配合生活,足以表现生活,就必须利用一切实际斗争生活中的新的名词。有些人以为大众化的语言要单纯,所以说:“描写红就用红得啦,偏要加上绯红,桃红什么的,那是诗人的做作。”说这话的根本不懂得语言的意义和作用。他以为大众化就是简单化、退化,不知道我们的生活越繁多,语言也必须越科学,越精细越好。

对于到现在为止还被很多人认作是论争的问题的诗歌用韵,我的意见是:一定要有作为诗的韵味,但韵脚可以不拘,基本上要不损害内容。那当然不用韵脚更自由、更有伸缩性,更能表达得流畅。如果能在不损害内容的原则下用自然多变的韵脚,读来顺口,便于记忆,也是好的。为了要押韵而把恰当的字眼换上不恰当的,把句法和名词硬弄得颠倒,那是应该极力反对的。

总之,韵脚不要损害语言的生动完整,形式要不妨害内容的表现畅达。

以上这些,也许仍是老生常谈。但我们能一面在生活与思想情绪上大众化,一面在创作实践上大众化,经常、普遍与深入的工作,诗歌的前途将会无限辉煌,诗歌的面目将会焕然一新的罢!

10月22日蓝家坪



## 严辰的诗歌道路<sup>①</sup>

朱先树

### 投入延安母亲的怀抱

1941年3月8日,严辰来到延安,投入了延安母亲的怀抱,新的革命生活就开始了。他和逯斐最初安排住在杨家岭,后又搬到蓝家坪。生活是艰苦的,但很安定。

严辰到延安后,主要是在文艺界抗敌协会搞创作,当时文抗有三十多人,不少是全国有名的作家。诗人初到延安,怀着当时一种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热情,延安的革命环境、革命生活,这一切都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歌唱延安的诗篇,抒写自己到革命根据地后的激动情怀。如他在《我来了》这首诗中描写诗人初到延安的心情就是十分真实而且真诚的。到了延安,生活在这革命圣地使他是那么的愉快,他曾“带着说不出的兴奋”漫步在延河边,“心头痒痒地,试想唱一支歌——唱一支对延安的崭新的恋歌”(《在河

<sup>①</sup>朱先树:《诗歌的流派、创作和发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237页。

边》)。由于延安待他的热情,使他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值得他礼赞的。诗人一到延安,就听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但他绝不是只为搜集创作素材而来的。他写道:“我投进你的怀抱,并不为听这些动人的故事;我的胸膛里,你知道,还有着沸腾的热血在奔流……”(《故事》)他也不是为过安定生活而来的:“我不为偷安而来,要取得明天的幸福,决不吝惜自己的热血”;“跳动在我心头的,只有燃烧得通红的献身的火……”

正如诗人真诚的表白一样,在1941年夏秋间初到延安的短短日子里,就唱出了不少热情而真挚的歌,尽管这些歌唱可能还是较为表面的,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怀抱中来,其热情和真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诗作,诗人曾总称为《唱给延安》,当时曾以《河边恋歌》为题,用AM的笔名,在桂林出版的《诗创作》刊物上发表,并编印单行本。这是诗人初到延安时生活情感的真实记录。

为了深入到革命生活中去歌唱,1941年秋,严辰和庄启东、魏伯一起步行到“三边”(即陕甘宁边区的靖边、定边、安边)。“三边”部队有一个警备团,团长是土地革命时的干部贺晋年同志。他们步行去,一路翻山越岭,所路过的地方,由于交通不便、国民党封锁,老百姓生活十分苦,用火柴都困难,平时只把火种埋在灰里。他们穿过一个沙漠,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才到定边。

在“三边”部队中生活采访,使诗人获得了旺盛的创作灵感,写出了不少诚挚的热情歌唱人民军队、歌唱人民战士的诗篇。在《我们的队伍》中,写一个由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刚集合起来的陕甘游击小组。《路》中写一个贫苦农民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的过程。这两首诗,可以说是诗人第一次接触人民军队生活,第一次热情歌颂人民军队所留下的诗篇,这些在麻油灯下用蘸水笔写在马兰纸上的诗篇,不单是一般地表现了诗人对人民军队的热情,而且也表现了诗人对中国革命斗争历程的认识,因而在诗人的创作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两首诗都是在“文抗”办的《谷雨》上发表的。

在到“三边”的这次行程中,还到了内蒙古边界,经过沙漠,到过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南部的阿拉川,使诗人大开生活眼界,写了很多诗,写草原的风物,但又都是和抗战的信念连在一起的,如写“马”这草原的骄子,实际上是写了草原人民的和平生活和他们被迫害侮辱而进行不屈斗争的形象。诗人写山川风物,都是与当时人民的革命斗争连在一起的。除了《马》以外,还有《阿拉川》也写的是这方面的内容。其他如《马会》《沙窝》《井泉》《晨》,虽然都是写的草原的风物人情,但诗中充满的是一种倔强的精神,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祖国河山是决不甘受屈辱的,即使是在《沙漠》《庙子》这样较为轻盈而抒情的诗中,诗人所要表现的也是对一种新生活的渴望和向往。如《庙子》中诗人把大沙漠比作汪洋大海,把喇嘛庙比作航船,他希望这航船启航远航:为什么还不启航呢?航轮,载着草原人民的苦难。他们的善良和勤劳,快驶向渴望着的绿洲去啊!这些诗作都是诗人当时真实感情的抒发,虽然诗人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从白区来到解放区,但在诗人的感情血流中,我们感受到的已绝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猎奇和轻浮的赞歌,而是和革命、和人民共着生命共着感情的真实情怀的流露。

从1942年以后,诗人又有不少创作。1942年初严辰到安塞一个退伍军人杨朝臣住的地方去生活了一段时间,写了一些诗作,如《劳动花》就是写的一个“好老杨,退伍军人的模范,新社会的新农民,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英雄”,这是普通劳动人民的颂歌。除此之外,他较早地写的如《塔》这首诗中歌唱延安的宝塔,把它作为革命的象征和希望。在《星的歌》中,也是把延安比作夜晚的星辰,在暗夜给人民以光明,大熊星为“艰苦地在夜里跋涉的人”辨清方向不致迷途,晨星在黎明前爬上东方,“为等待鲜红的朝阳来临,它浑身激动得不住地发抖”。诗人歌唱野花,迎春花带来春的消息,带来春天“耀眼的希望”;牵牛花“在野地里蔓延,用自己的脚开辟着道路”,“它只管在野地里自由生长”,并且“唯有在太阳里它才舒展”。写驮队在夜晚行走,“坚韧地驮着黑夜,驮着黑夜一样深的人民的苦难,艰苦地跋涉”,在白天行走则“如同胜利归来的军队”。写农民的《春耕》,写出了农民生产劳动的艰辛,写他们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的苦痛,写他们在边区政府领导下“播种希望和幸福的种子”的欣喜心情,写和农民一起“歇夜”,村民们“讨论合作运动,和健全自己的问题”等,都具有十分浓烈的生活气息。而在《花马池》《城头上》等诗篇中写边区人民的生活、风俗也有生活气息的。

诗人来到解放区,革命的大家庭是温暖的,革命的生活自然是充满了诗意的,但诗人在更深夜静时,仍然难免常常忆起自己的家乡和乡亲。他的“夜恋”之一的《外祖母》和“夜恋”之二的《夜航船》是这方面内容的代表作。

当然,这一段时间,诗人写个人感受的诗篇更多的仍然是和表现延安边区军队生产生活和斗争联系在一起。《春耕》是1942年3月12日写于延安蓝家坪,这首诗是歌颂延安翻身农民的喜悦和进行愉快劳动的心情的。这首诗最早发表于延安文抗的刊物《谷雨》上。

在这一段时间,诗人歌唱部队战士,特别是歌颂军民鱼水关系的诗篇,有《我看见太阳了》,写一个在一次爆炸试验中失去了双眼和左臂的女同志,以顽强的意志和病残做斗争,领导和同志们对她的关心和爱护的情景。《一个瞎老婆的话》写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对八路军的热爱和赞扬,表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江波大队》写一个部队转移后留下工作的女同志和人民群众的血肉深情。《平原散歌》《雪原上》《盐海》等都是写人民支援革命、军队帮助人民的动人情景的。另外,还有《神兵连》,也是写军民关系和艰苦奋斗的。这些诗篇标志着诗人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直接投身革命,歌颂革命斗争和斗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是诗人的创作从知识分子自我走入革命斗争旋流的一个创作转变新时期。

### 到解放战争的前线去

1943年整风开始,文抗解散,严辰和鲁藜、李又然、李雷三个诗人一起分配到鲁艺教研室工作。这一年多基本没写东西。在山坡上劳动,开荒种土豆,三人合作,中午在山上也不回家,用装马粪的柳条筐遮太阳休息一会儿。《生产短歌》就是写这种劳动的。

1944年夏天,严辰到三五九旅(南泥湾)去了一个月,回来后就分配到中央党校第四部工作。四部的学员大部分是长征老干部,他们主要是学文化。严辰在这里教书直到日寇投降。

抗战结束后,要组织一些人到前线去,当时组织了两个文工团,一个是东北文工团;另一个是华北文工团,严辰参加了后者。1945年10月至11月,从延安步行渡黄河,通过尚为敌人控制的铁路封锁线,直到张家口,一路走一路搞宣传和创作。那时华北文工团分四个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组组长陈企霞,成员有孙犁、萧逸、李肖白、贺敬之、逯斐、李冰、熊焰、严辰等,每天轮流记日记,一路写街头诗。华北文工团到张家口时,原在河北山区的成仿吾为校长的晋察冀联合大学也到了张家口,为了尽快培养干部,华北文工团并入晋察冀联大,成立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副院长艾青,原华北文工团四个组的干部,成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的骨干、教员,陈企霞是文学系主任。在这之前,严辰还给《张家口日报》当了一段临时记者,和《晋察冀日报》记者一行数人,曾沿着长城线以北,步行到承德去采访过。经过延庆县时,他们看到了这里老百姓什么都被日本人搞光的惨相,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老百姓穿。严辰这时写了一些文章,后来以《在城郊前哨》为名出版单行本(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11月),这是一本通讯报告集。这时诗人的诗歌创作较少,但诗人的热情还是不减的,写于1945年12月的《生命的春天》的诗,就是“给张家口工人首届代表大会”的。

诗人在采访过程中,也曾写过揭露国民党违背停战协定,向我军进攻而被歼灭的诗篇:《设法为你们立一支墓碑》(1946年3月),这首诗揭露了国民党的残暴无耻,国民党军人的无辜送死,诗人表达的是一种痛惜而愤慨的感情。后来张家口失陷,晋察冀联大改为华北联大搬到河北束鹿县(今辛集市)一带较大的村庄,在文学系教书的有陈企霞、何洛、严辰、萧殷、蔡其矫等。严辰在这段时间曾参加过三次土改。第一次在束鹿(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这里),只搞了个把月,因形势紧张而提前结束,严辰收集了一些民歌(没出版)。第二次在束鹿,写过两首长诗《小沈庄》和《新婚》。《小沈庄》写一个村庄的变迁史。《新婚》这首诗描写的是一对新婚青年男女。这两首诗都是写在土改工作的时候。内容都是反映土改斗争的。严辰第三次参加土改是在石家庄东面的农村,那时属获鹿县(今鹿泉市),这次几个人包一个乡,时间有半年之久,由于工作紧张,没有什么诗作问世。

石家庄解放后,萧殷编《石家庄日报》副刊,严辰断断续续写过好几首讽刺诗,总题《狐鼠篇》,可惜这些诗篇没有能收集起来。那时华北大学在正定的一个教堂里,在这里,严辰在诗歌创作的数量上虽然不算多,但也写了一些诗作,如《爷爷牵了头(牲)口回来了》《李大娘》《姑嫂》等,都是写贫苦农民翻身解放后的崭新的精神面貌。也许是参加了土改和农民有所接近的缘故,在诗风上有意识地学习民歌的情调,这可以说是严辰在土改工作中积累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写成的诗篇。

### 为新中国建立而歌唱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严辰作为华北大学文学创作组长,和吕剑、唐因一起到北平外围的围城部队四十一军深入生活。严辰所在的师,在右安门外的村庄里,那时对峙的双方偶有零星的枪击,严辰参加了喊话,并准备随部队攻城。以后北平和平解放……北

平解放的第一天严辰就随部队进城了，他在文化接管委员会工作，一天到晚审查积存的旧电影，那时睡在接管的国民党一个特务机关的水泥地上，铺一张“榻榻米”，盖一床进城时背着军用棉被，外出都是步行，虽然生活清苦，但精神健旺，工作紧张、满怀解放的兴奋、欢快。严辰和唐因、吕剑等为搞工人大合唱写歌词，由张鲁谱曲。全国第一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筹备期间，由沙可夫负责，严辰被分配做编辑工作，搞大会会刊《文艺报》。《文艺报》一共有三个编委，茅盾、胡风、严辰（负责具体工作）。半月出一期。另外，参加具体工作的还有杨犁、董均伦、钱小惠，主要搞采访、校对、发行等。会刊出了十三期后，会议结束，决定办刊物，《文艺报》由丁玲主编（可能有冯雪峰）；《人民文学》由茅盾主编、艾青副主编，严辰参加《人民文学》创刊工作，任编辑部主任。刚解放，严辰和吕剑、侯敏泽还搞了一个刊物《文艺劳动》，由中外出版社出版，发表了许多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如孙犁、康濯、秦兆阳、方纪、王朝闻……该刊共出六期。《人民文学》创刊，由于严辰、吕剑参加了《人民文学》工作，侯敏泽参加《文艺报》工作，《文艺劳动》就停刊了。

这一段时间，严辰的诗歌创作也是活跃的。他的诗歌主要是写歌颂新中国成立为题材的较多，如《我们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以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歌唱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藐视，以及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在《国旗》中，歌颂新中国十月的国旗是“战斗的意志”和“无穷的力量”的象征，是人民近百年来追求，它指引着新的奋斗方向。《织工》的意图是歌颂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同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迎新曲》中歌颂新中国辞别旧岁，跨进新的年代的自由幸福生活……严辰就是这样以一个诗人的热情，新中国主人翁的自豪来歌唱新中国的成立，歌唱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真正的翻身解放。正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诗人以怀着景仰和敬慕的心情歌颂了苏联的十月革命，《自从第一面红旗升起——为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作》《我们最尊敬的同志——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这些诗篇都是当时时代感情的真实记录。

### 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去

1951年春，严辰第一次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写了许多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英勇的朝鲜人民的诗，结集成为《战斗的旗》出版。

严辰从朝鲜战地回来，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一年多，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创，他任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编辑出版了许多“五四”以来以及新的创作集子。1953年严辰又一次到朝鲜，那是作协组织的作家访问团，参加的还有罗烽、白朗、王西彦、碧野、胡奇、毕革非、武兆堤等。作家访问团到开城，还到了板门店，那时停战谈判正紧张。停战后，严辰他们又到参加第五次战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后又参加朝鲜战斗英雄大会，和英雄们一起，住在万景台章命贵族学校，受到热情接待，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和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使诗人永远难忘。诗集《英雄与孩子》就是这次到朝鲜的作品结集。这些诗篇都是诗人怀着对英雄的崇敬，对祖国人民的爱写成的，感情真挚热烈。

### 他的心愿：坚持深入生活、歌唱生活

从朝鲜回来后，严辰到中国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1955年春天他又到福建前线，先



到浙江访问海军部队,出海门登上刚刚解放的大陈岛,那时大陈岛为敌人破坏,断垣残壁一片荒凉,阒无人迹。之后又到福建厦门,去和金门隔海相望的黄厝,和离金门更近的大嶝岛小嶝岛,还采访了女民兵洪秀丛。

从福建回来,刚想坐下来将这次的感受写成作品,运动开始,写作中断,直到1955年冬天作协让严辰去搞《新观察》和戈阳同任主编。那时《新观察》在作协刊物中发行量较大,为了及时反映新的形势,他和郭小川合作写了配画的组诗。1956年冬天,严辰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到苏联访问,参加这次访问的还有靳以、戈壁舟,到1957年1月才回来,写了访问苏联的诗集《最好的玫瑰》。这个诗集出版正逢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诗人是把它作为节日献礼的。《看天鹅舞》,作者用柔美抒情的笔调写了看一场芭蕾舞剧的感受,这是美的享受,也是一种思想的启迪,“在光明与至善的希望里,我勇往直前,一无所惧”。诗人用走在深夜冷静的街头吟诵普希金的诗句来结束,余味深长。在《雪花满了你黑色的大氅》《你去到了那里》《穿过潮湿阴暗的巷道》里分别写在普希金像前、马雅可夫斯基故居和涅克拉索夫博物馆,还有《舍甫琴科》等诗中,诗人以崇敬的心情歌颂这些文化名人的伟绩和在人民中的深远影响,抒情味道都比较浓。《拉兹里夫》是写列宁避难处的。诗人足迹所到的还有塔什干、撒马尔罕、第比利斯、黑海、高加索的阿丽察湖、乌克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等等,诗人都留下了诗篇,对苏联人民的革命和建设进行了歌颂,说明中国人民与苏联人民的友谊不管遭到什么风浪,也是长存的。

1957年冬,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当时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意味深长地谈了一次话,希望大家到生活中去,能找到自己的生活基地。周总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起了作家们的责任感,都诚恳地选择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基地。严辰和逯斐挑选了黑龙江,他们曾去那里的大森林里跟随森林调查队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此很有感情。从1958年到1965年严辰跑遍了大小兴安岭的大森林,萨尔图大草原,去了边远的呼玛、黑河、东宁、饶河……以后去了大庆。诗人到了黑龙江,首先是到勘测队生活。1958年写的《勘测之家》《南海青年》《老沙金工人》等诗,就是反映他们的野外生活的。《罕拜舞》和《唱一万支歌》《骏马》等是写达斡尔族人民的生活。《爬犁队》《鄂伦春人》是写鄂伦春族的。这些诗都是诗人初到黑龙江的时候写的,表现了少数民族生活的变化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1958年,严辰的创作收入集子的并不多。1959年,由于他坚持到生活中去,创作又丰富了,写出了不少关于黑龙江大森林以及表现黑龙江人民生活变化、歌颂革命斗争先烈等的诗篇,如《小兴安岭》《森林之城》《汤旺河》《青青的林子》,另外还有《天梯》《踏着老共青团员的脚印》等。1960年写了《三八包乘组》《养猪能手》等等。以上作品结成一集,取名《山丹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1年年初,严辰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波兰。在访问的短短日子里,诗人写了《密茨凯维支像》《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以及《奥斯威辛集中营》(组诗)等诗篇,歌颂了波兰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这是诗人第二次出国访问创作上的收获。

1961年从波兰回来后,下半年(9月、10月间)参加了由《诗刊》组织的新疆访问团,同行的还有田间、张志民,而作为向导、翻译的,则是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在这次访问活动中,诗人写了不少美丽的诗篇,歌颂新疆风土人情和边疆的建设成就,如《边疆》《绿洲》《坎儿井》《葡萄沟》《和田》《乡情》《织地毯歌》等等。

从1961年后,诗人在黑龙江继续写了不少反映黑龙江各地风光、风土人情和人民群众的劳动以及从事建设新生活的诗篇。这些诗篇定名为《青松篇》,共十五六首诗,主要是写东北兄弟民族生活变化的,如《鄂伦春谣曲》《东方红》《朋柳克》是写鄂伦春族人民生活的,《大路》《莫日根》等是写赫哲人生活的。另外像《对歌》《桑布老人》《赛马》等,又是写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对歌、摔跤、赛马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活动。还有些诗篇如《柳荫下》《江上》《草原》《乌布图河》等,则是写鄂伦春族、朝鲜族的自然风土人情、人民的生活劳动和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的。

1963年新春,严辰曾到广东的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访问,又有不少诗作,通命名为《红棉篇》,与写黑龙江的《青松篇》、写新疆行的《白杨篇》一起合集为《春满天涯》。

1964年以后,严辰到大庆深入生活,创作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建设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将军——部长》是写战争年代的将军、和平建设时期的领导同志如何和人民群众一起开采石油的事迹。《铁人》《英雄的手》《一串钥匙》等是歌颂石油战线英雄人物的。《三年》是写油田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的。

### 他仍然在为诗歌事业呕心沥血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严辰和其他老同志、作家诗人们一样,挨过批斗,干过很多重体力劳动,烧过砖,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冬,一个人拉着爬犁去荒山雪地割草。直到1970年回到哈尔滨,1971年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却一直没有分配他工作,1976年只好退休回无锡老家。

粉碎“四人帮”后,一切工作开始恢复,1977年《诗刊》决定把他调回北京工作。当时《诗刊》的李季同志调《人民文学》后,由严辰接任主编,在这之后,诗人又开始恢复了诗的创作和诗歌活动。

1979年8月中国作协派作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严辰任团长,参加的有刘心武、鄂华。诗人这次创作了不少诗作,后来这些作品以“玫瑰”为题,加上部分1957年、1961年出访苏联和波兰的部分作品,以《玫瑰和石竹》作诗集名编入了诗刊社主编的诗人丛书第一辑。这些作品,标志着诗人创作热力的恢复。主要篇目有《比邻》《相别离》《接吻门》《故乡》《罗马尼亚的觉醒》《玫瑰》《牧笛》等,以及包括六首短诗的组诗《金星》。这些诗作,有的是访问罗马尼亚的观感,有的是歌颂罗马尼亚的优秀文化和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有的是对罗马尼亚城市、土地和人民的赞美,诗人对这异国风情和中罗人民友谊的赞颂仍然是充满了深情,表达出了一片赤子之心的。

严辰由于工作繁忙,年事已高,创作数量是减少了,但他一旦有机会会有感情触动,他仍然是要写诗的。1983年中国作协同意他几次提出的要求,决定不再让他做《诗刊》主

编,只担任顾问职务。但老诗人的一颗诗心是决不会退休的,他仍然在关心着《诗刊》工作,关心着整个诗歌事业,为诗人们编诗集丛书等,仍然在为诗而呕心沥血。

1984年8月—9月

## 严辰的诗并非“小花闲草”<sup>①</sup>

诗人严辰在回顾自己写诗的历程时,曾谦虚地说,在文艺的百花园里,他的诗是“既没有艳丽的色泽,又缺乏浓郁的芳香的小花闲草”,并且用“半生学诗未成家,徒将苦吟误年华。仗剑空论潜大海,哪来龙珠烛天涯”的诗句,来说明他“虽半生摸索”,仍“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事实上,他是一位辛勤劳动,不断探索,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的诗人。他的诗并非“小花闲草”,而是充满春天气息的“玫瑰与石竹”,有如耀眼的“繁星”,美丽的“红霞”,给人以光明,以春的喜悦。

严辰,江苏省武进县(武进区)人,1914年生。从3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40年代初在延安写了不少诗篇,结集为《晨星集》。新中国成立以来,严辰热情饱满,创作勤奋,先后出版了《繁星集》《红霞集》《春满天涯》《玫瑰与石竹》等诗集。由新中国成立前翘首遥望天边初现的晨星,到新中国成立后歌唱繁星如海、红霞似锦、春满天涯的美景,诗人唱出了新旧中国的巨大变化,表现了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诗人两次奔赴朝鲜前线,以热情洋溢的诗篇歌颂中朝人民的深厚友谊(《友谊》《同一片云彩下》);描写守卫在前沿阵地的青年孤胆英雄(《守卫》)和战火中救护婴儿的慈母般的勇士(《勇士·慈母》);赞颂潜伏在雪地的战士们铁的纪律(《雪地潜伏》);表现了朝鲜人民杀敌卫国的英雄气概(《平壤》《我的歌献给你》《从血泊里站起》《三个炮兵大尉》);赞美黄继光及其他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崇高形象(《永恒》《红旗手》);形象地揭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祖国》《英雄与孩子》)。这些诗都饱含着诗人战斗的激情,写得深沉感人。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鼓舞着诗人深入到北国南疆,去采撷诗的蓓蕾,捕捉歌的浪花,写出了不少充满时代气息和建设者欢乐的诗篇。这些诗把人们带到了小兴安岭深处“无穷无尽的绿色之海”和“正喷发出炫目的光焰”的丝绸古城和田;带到了“海风吹处四季长青”的海南宝岛和一排排钻塔如林的大庆油田。诗人还以崇敬的心情,把人们引到雨花台、韶山冲、南湖、农讲所、延河、龙华、井冈山、红岩等革命纪念地,让人们回顾往昔艰苦的战斗岁月,瞻仰烈士的英姿,缅怀先辈的业绩,鼓舞人们扬帆鼓风,“斗志昂扬地向新的征途航行”。粉碎“四人帮”以后,诗人老当益壮,意气风发,写下了许多热情歌颂新时期崭新生活的诗篇,一些表现国际题材的诗作,显得别有情趣。

严辰的诗,具有感情深厚、简朴明朗、节奏舒展的特点。诗人善于把一些常见的生活

<sup>①</sup>徐纪明等:《中国当代文学采英》,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206页。

现象加以集中、渲染,显示出不平凡的光彩。《勇士·慈母》这首诗,写一个志愿军战士穿过燃烧着的乡村去追击溃退的敌人,从血泊里抱起个冻僵的婴儿,然后一手抱着婴儿,一手紧握自动步枪去歼灭敌人。这类故事在朝鲜战场上是经常发生的,经过诗人的概括提炼,写成了动人的诗篇:“一个战士去把她寻找,小身体已冻得冰冷,母亲躺倒在血泊里,婴儿还在乳头上吸吮。战士解开自己的棉衣,把婴儿包裹在胸前,他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她,他把自己的脸和婴儿的脸贴紧。冷风吹得一阵紧一阵,婴儿哭得哑了声音,战士默默地掉下眼泪,并非懦怯,这是燃烧的仇恨。”这些场面和细节本来就催人泪下,再加上诗人给予渲染,就使得悲怆的气氛更加浓烈,更加沉重,不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人同战士一起燃烧起愤怒的复仇的火焰。《英雄与孩子》描写少先队员向战斗英雄献花的场面,诗人一开头就用“孩子们像一群小巧的白鸽”的比喻和几个“他们……进来”的排比句式,造成了一种热烈欢腾的气氛,然后紧扣孩子们手中的鲜花、脖颈上的红领巾和战士们胸前闪闪发亮的金星勋章着以渲染,烘托映衬,把孩子敬慕英雄、英雄保护孩子的主题,透过诗情画意的描写,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孩子们的红脸蛋,和英雄们的脸紧贴在一起;鲜花抱在孩子们的小手里,孩子像鲜花一样抱在英雄的臂弯里。孩子的脖颈上,戴着鲜明的红领巾——那是先烈们的热血所染成,那是英雄们的热血所染成。英雄的胸前,金星勋章在闪闪发亮——那是孩子们水晶般的眼睛,那是孩子们水晶般的心灵。孩子是英雄们的未来,英雄是孩子们的未来;孩子们把英雄像理想一样拥抱,英雄们把孩子像火炬一样举高。”深刻的思想、巧妙的比喻和联想造成了优美的诗的意境,给人以美的感受。

严辰新中国成立前的诗,多以自由体的形式抒发情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逐步追求章法整齐、句式匀称、音韵和谐,虽然有时显得不够活脱奔放,但却具有民歌自然流畅的韵律和古典诗词锤句炼字的特点。如写“三千里江道,三千里碧琉璃,三千里玉树琼花,三千里风雪迷离。鸟敛翅,兽匿迹。碧琉璃上,滑行着一张张冰爬犁。马儿如飞,四蹄腾空冒汗气;人儿似钢?鞭梢上月落星稀。”(《江上》)北国的壮美雪景和冰上飞行的雪犁尽现笔端,写来不同一般。这些诗句既有民歌的风格,又有古典诗词的韵味,语言简朴平易,表现凝练有力,别具一格。

## 创作及文学活动年表

1930年秋起,在县报上发表一些诗歌,编写了一个时期的诗歌副刊《怒涛》。

1934年开始在《申报》《诗歌月报》《文学》《现代》等报刊上发表诗作,曾创办《当代诗刊》,后加入中国诗人协会。

抗日战争初期到过武汉、重庆,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大地画刊》《文